

纪念黄遵宪逝世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论文汇编

时 间：2005年3月18日—20日

地 点：嘉应学院

主办单位：嘉应学院 中共梅州市委宣传部

· 编 前 话 ·

纪念黄遵宪逝世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论 文 汇 编

时 间：2005 年 3 月 18 日—20 日

地 点：嘉应学院

主办单位：嘉应学院 中共梅州市委宣传部

• 编 前 话 •

1、《论文汇编》仅作为会议交流之用，不同于会后正式编印出版的论文集，因此，未对提交的论文进行审阅筛选。

2、论文排序与《会议手册》中的“与会代表名单”排序一样，基本上依作者地域单位相对集中排列。

3、因时间紧张，对所提交的电子文稿，仅稍加编辑，未对其中内容进行校对，亦未对文章格式严格统一。对所提交的文字稿，亦在打印后仅进行过一次简单的校对。所以，本集中的错漏肯定不少，幸勿为过。

4、对所提交的照片和一些在文集付印后才提交的论文，未能在此给予录入，谨致歉意！

编 者

二〇〇五年三月九日

目 录

黄遵宪研究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	王晓秋(1)
黄遵宪的开放意识及其诗歌的审美取向	郭延礼(11)
别创诗界的黄遵宪	关爱和(20)
黄遵宪启蒙思想论略	李可亭(34)
黄遵宪的经世致用思想与实践	高建立(38)
黄遵宪诗文考论四题	左鹏军(43)
黄遵宪《日本国志》的编纂与明治初期的日本汉学家	刘雨珍(53)
黄遵宪外交思想略论	吴振清(60)
黄遵宪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贡献	丘铸昌(62)
略论《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对梁启超的评价	张永芳(67)
从黄遵宪与日本汉诗人的交往看甲午战争前的中日关系	李寅生(80)
黄遵宪思想转变与冈鹿门	张应斌(86)
从“加富尔”到“马志尼”	李瑶平(93)
黄遵宪对中国民俗学的贡献	杨宏海(100)
华裔加拿大人对黄遵宪的观感	熊恒浩(103)
黄遵宪评传	丘菊贤(106)
清朝的对侨政策与黄遵宪的护侨举措	廖荣春(114)
论清末杰出的外交家黄遵宪	饶金才(117)
黄遵宪与诗界革命	王子霞 梁德新(122)
黄遵宪尸体释谜	程志远(125)
黄遵宪:近代中国改革开放和走向世界的先行者	谢永昌(128)
黄遵宪的名、字、别号考析	黄广昌(132)
黄遵宪发现下马石解开千古迷	黄广昌(135)
黄遵宪致小赤书两封	黄广昌(136)
人境庐建年辨析	黄广昌(138)
客家童婚的社会人类学分析:以粤东梅县为重点考察	房学嘉(141)
黄遵宪家乡兴学活动略论	肖文评(157)

黄遵宪《小学校学生相和歌》简析	夏水平(162)
论黄遵宪的民族国家意识	严飞生(169)
黄遵宪与“诗界革命”	李海冬(176)
从“我诗我自作”到“我手写我口”说开去	邓晋东(185)
黄遵宪与“诗界革命”	丁思深(190)
黄遵宪教育思想述评	何尚武(196)
浅谈黄遵宪笔下的客家妇女形象	魏启清(200)
论黄遵宪与日本	韩小林(205)
论二十世纪初“引进西学”与“保存国粹”的思想与实践	魏明枢(211)
黄遵宪地方自治思想述评	张玉萍(216)
黄遵宪·晚清诗界与现代性	曾令存(223)
黄遵宪关于甲午战争的诗意裁判	邓达文(225)
黄遵宪诗歌革新的演进历程	郭真义(231)
略论黄遵宪的客家情结	王濯巾(237)
试论黄遵宪的咏物诗	汤克勤(245)
黄遵宪歌行简论	罗彦民(249)
“我手写我口”与客家民歌	朱银锦(256)
丘逢甲、黄遵宪——梅州“文化之乡”的奠基人	陈千华(261)
(106) 黄 遵 宪	黄 遵 宪
(111) 春 荣 堂	春 荣 堂
(117) 卡 金 街	卡 金 街
(121) 潘 彭 黎	潘 彭 黎
(125) 丘 逢 甲	丘 逢 甲
(129) 丘 逢 甲	丘 逢 甲
(133) 丘 逢 甲	丘 逢 甲
(137) 丘 逢 甲	丘 逢 甲
(141) 丘 逢 甲	丘 逢 甲
(145) 丘 逢 甲	丘 逢 甲
(149) 丘 逢 甲	丘 逢 甲
(153) 丘 逢 甲	丘 逢 甲
(157) 丘 逢 甲	丘 逢 甲
(161) 丘 逢 甲	丘 逢 甲
(165) 丘 逢 甲	丘 逢 甲
(169) 丘 逢 甲	丘 逢 甲
(173) 丘 逢 甲	丘 逢 甲
(177) 丘 逢 甲	丘 逢 甲
(181) 丘 逢 甲	丘 逢 甲
(185) 丘 逢 甲	丘 逢 甲
(189) 丘 逢 甲	丘 逢 甲
(193) 丘 逢 甲	丘 逢 甲
(197) 丘 逢 甲	丘 逢 甲
(201) 丘 逢 甲	丘 逢 甲
(205) 丘 逢 甲	丘 逢 甲
(209) 丘 逢 甲	丘 逢 甲
(213) 丘 逢 甲	丘 逢 甲
(217) 丘 逢 甲	丘 逢 甲
(221) 丘 逢 甲	丘 逢 甲
(225) 丘 逢 甲	丘 逢 甲
(229) 丘 逢 甲	丘 逢 甲
(233) 丘 逢 甲	丘 逢 甲
(237) 丘 逢 甲	丘 逢 甲
(241) 丘 逢 甲	丘 逢 甲
(245) 丘 逢 甲	丘 逢 甲
(249) 丘 逢 甲	丘 逢 甲
(253) 丘 逢 甲	丘 逢 甲
(257) 丘 逢 甲	丘 逢 甲
(261) 丘 逢 甲	丘 逢 甲

黄遵宪研究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

王晓秋

一、黄遵宪的历史地位与黄遵宪研究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是中国近代一位有着多方面成就建树并影响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杰出历史人物。他是近代中国卓越的外交家、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还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和民俗学家,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位优秀代表人物。

说黄遵宪是杰出的外交家,因为他历任驻日本、英国参赞,驻美国旧金山与新加坡的总领事,还被任命过驻德国、日本公使(均未赴任)。在19年的外交生涯中曾为维护中国主权、保护华侨、华工权益,促进中外友好与文化交流,作过许多贡献,并被外国人誉为“有清一代最有风度、最有教养的外交家”。说他是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是由于他不仅大力宣传倡导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和启蒙思想,而且勇于实践,亲自在湖南推行新政,厉行改革,开全国风气之先。说他是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则是因为撰写了《日本国志》这样的史学巨著和《人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等不朽诗篇,并提出“详古略今”、“我手写我口”等史学、文学革新主张。他还倡导了晚清的“诗界革命”,创作了大量充满爱国主义感情,反映中国近代与日本近代许多重大历史题材的诗歌,被称为“一代诗史”。还开中国近代中外民俗研究之先河,提出许多精辟的理论见解,并对中、日民俗进行了大量考察、描述和比较研究。

黄遵宪又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贡献卓著的杰出代表人物。1877年冬至1882年春他担任第一任驻日使馆参赞官,是首届中国驻日使团中的核心人物。在对日本外交事务中,既主张中日两国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各求富强,共御外侮,又对日本统治集团侵犯中国与邻国主权的行为坚持原则,据理力争。作为中日友好的使者,黄遵宪广泛结交日本各方人士,进行各种中日文化交流活动。由于黄遵宪学问渊博、待人诚恳,因此博得日本各界人士极大的尊敬和赞誉,“仰之如泰山北斗”。以至到他住所拜访的日本人,“执经者、问字者、乞诗者,户外屐满,肩趾相接。”留下了不少与日本友人的唱和诗篇、笔谈记录、题字、序跋。黄遵宪对中日文化交流最大的贡献还是他的巨著《日本国志》和诗集《日本杂事诗》。这是他对日本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和分析思考的结晶,也是近代中国人日本研究的集大成代表作。它们大大加深了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和认识,推动了近代中国人的日本研究,而且成为中国维新运动的重要启蒙读物,近现代中国人了解、研究日本的主要参考书。因此,说黄遵宪为中国日本学研究的先驱者、开拓者、奠基者,确是当之无愧的。

从上所述,可以大体看到黄遵宪在中国近代史和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因而对黄遵宪的研究,无论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外交、思想、文学史,或者中日关系史与中日文化交流史,都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对近代中国对日本研究史(也可以称作中国的日本学史),更是一个关键性的重要课题。研究黄遵宪,对于加深中日两国人民的互相理解,促进中日友好,推动中日文化交流,也有重大现实意义。黄遵宪对日本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勤奋写作和广泛友好交流的精神,值得我们继续发扬。中国著名的文学艺术家、前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夏衍先生在《从〈忠臣藏〉想起黄遵宪》这篇文章里有一段语重心长的话。他说:“黄遵宪是一个值得我们外交工作者尊敬和学习的榜样。”现在离黄遵宪出生的年代,时间已经跨过了一百多年。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和五大洲的一百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我们已经为数以千计的外交官驻节国外。我们希望我们的外交工作者能像黄遵宪写出《日本杂事诗》那样的诗篇,写出《日本国志》那样的史书,为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为共同反霸和保卫世

界作出各自的贡献”。我想这段话不仅对于外交工作者,而且对于学术工作者、文学艺术工作者,特别是从事日本学研究和中日文化交流工作的人来说,也是非常适用的。

二、黄遵宪研究的历史回顾

长期以来,黄遵宪的历史地位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最初的黄遵宪研究,多数仅仅是把他作为一个诗人,从文学的角度加以评价。而从政治、外交、思想、学术等角度论述的却较少,综合研究的也不多。

黄遵宪生前曾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国中知君者无若我,知我者无若君。”去世后,梁启超为其写《墓志铭》,概述黄遵宪先生生平事迹,并感叹:“悲其一生之进退死生,与一国之荣悴相依。”梁启超还在《饮冰室诗话》中记载了许多黄遵宪的遗诗和逸事,并评价道:“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清末许多诗人的文集和诗话中都论及黄遵宪,如潘如史的《在山泉诗话》、狄葆贤《平等阁诗话》、袁祖光《绿天香雪籍诗话》、陈衍《石遗室诗话》、王遽常《国耻诗话》等。高旭《愿无尽庐诗话》甚至认为:“黄公度诗独辟异境,不愧中国诗界之哥伦布矣,近世洵无一人。”

年谱方面,较早的有尤炳圻编的《黄公度先生年谱初稿》(收入《人境庐诗草》校本本附录三,民国二十二年北平文化学社印本),内容较疏略。较详细的有钱仲联编的《黄公度先生年谱》,除尤编资料外,还引用了翁同禾、袁旭、薛福成等人著述,特别是引用了其从弟黄遵庚的口述资料以及黄遵宪与梁启超、严复等人来往信件及论学、论诗手稿等珍贵资料。钱仲联长期致力于遵宪《人境庐诗草》的研究笺注,所编《人境庐诗草笺注》(1936年出版,1957年重版,1981年修订版)一书旁征博引,颇见功力,是研究黄遵宪的必读之书。

1985年香港学者吴天任出版《清黄公度先生遵宪年谱》,吸收新资料和研究成果,对钱谱又有所修订和补充。

传记方面,解放前有《清史稿》“黄遵宪传”,温延敬《黄遵宪传》、古直《黄公度先生小传》等。解放后,1951年王瑶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晚清诗人黄遵宪》一文,1957年出版了麦若鹏的《黄遵宪传》,1961年出版牛仰山的《黄遵宪》,开始用新的观点评价黄遵宪,但是都比较简略。

1959年新加坡华人学者郑子瑜出版了研究黄遵宪的论文集《人境庐杂考》。他还在《南洋学报》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黄遵宪的论文。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编的《人境庐集外诗辑》。1968年日本早稻田出版了郑子瑜与实藤惠秀合编的《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这些都是研究黄遵宪的重要资料。

1972年,上海出版社出版了杨天石所著《黄遵宪》,对黄遵宪一生进行了比较深入考察分析,注意了黄遵宪既是诗人又是政治活动家这两个方面。书后还附录了作者所见的《黄遵宪文目初编》,共103篇目录。

20世纪80年代黄遵宪研究步深化,国内外发表了一批研究论著和论文,涉及黄遵宪生平和文学、政治、外交及其史学成就等各个方面,并对《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人境庐诗草》等作品进行了深入专门的研究,由于篇幅关系在此不能一一列举。值得提出的是国内开始有人以黄遵宪研究为博士论文题材,并撰写成专著。如1987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华东师大博士盛邦和的《黄遵宪史学研究》,着重剖析黄遵宪史学思想的发展演变,有一定深度。1988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广州暨南大学博士郑海麟的《黄遵宪与近代中国》,全书共11章454页,这是国内青年学者撰写的一部有较高水平的黄遵宪研究专著。

资料方面出版了一系列黄遵宪诗歌的新选本,如1985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钟贤培等选注的《黄遵宪诗选》。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刘世南选注的《黄遵宪诗选注》。另外,钱仲联修订了《人境庐诗草笺注》,钟叔河辑注了《日本杂事诗广注》,都是这两种诗集较好的注本。

20世纪90年代黄遵宪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郑海麟、张伟雄编校了《黄遵宪文集》,于1991年10月由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笔谈、论著、序跋、书信、公牘共121篇,为黄遵宪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原始资料。而李庆编注的《东瀛遗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稀见史料辑注》,也收录了黄遵宪《朝鲜策略》与宫岛诚一郎笔谈等原文。从各种角度研究黄遵宪的论文也有好几十篇,尤为可喜的是又有一些中外大学的青年学生选择黄遵宪研究作为自己的博士、硕士研究生论文课题。据我所知,已完成的如复旦大学黄升伍的博士论文《黄遵宪与晚清改革思潮》,就读北京大学的韩国留学生柳垠再的硕士论文《黄遵宪的〈朝鲜策略〉对朝鲜政局的影响》,日本东京学艺大学广户真理子的硕士论文《黄遵宪在日本时期之友人关系》等篇。这些论文既有新意,又反映黄遵宪研究后继有人。

这里还要补充港台学者的黄遵宪研究成果,香港学者除吴天任著的《黄公度先生传稿》和《清黄公度先生遵宪年谱》外,还有王德昭的论文《黄遵宪与梁启超》。梁通也多年致力于黄遵宪研究和弘扬黄遵宪事迹。台湾学者张朋园的长篇论文《黄遵宪的政治思想及其对梁启超的影响》,颇有见地。王玺写了《黄遵宪对日本的认识》并主编了《黄遵宪传记资料》。1991年台湾文史哲出版了张堂铨的著作《黄遵宪及其诗研究》。

海外黄遵宪研究最有成就的是日本学者,著名的有实藤惠秀、铃木虎雄、石原道博、蒲地典子、佐藤保、岛田久美子、伊原泽周等人。实藤惠秀以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和中国留日学生史著称,曾把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译成日文,还与郑子瑜一起编校了《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铃木虎雄对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有深入研究。石原道博则撰写了长篇论文《黄遵宪所著〈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茨城大学人文学部纪要》)。留美日本学者蒲田地典子著有《中国的改革——黄遵宪与日本模式》,是一部视角新颖、影响较大的黄遵宪评传。佐藤保1958年就写了关于黄遵宪新诗的论文,后来又发掘了不少新史料,撰写了《黄遵宪与日本》、《黄遵宪关系日本残存资料初探》、《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等一系列论文。岛田久美子译注了中国诗人选集《黄遵宪》(岩波书店,1963年),最近又指导神户大学研究生注释全部《日本杂事诗》。伊原泽周也对黄遵宪加以研究。

欧美和亚洲、大洋州其他国家也有一些学者在进行黄遵宪研究。如加拿大学者林理彰研究黄遵宪与明治时代的日本,别具特色。澳大利亚学者梅卓琳研究黄遵宪《日本国志》的改革思想及其对百日维新的影响。瑞士学者巴门也对黄遵宪进行了研究。新加坡学者着重研究黄遵宪在新加坡任外交官时期的活动,而韩国的一些学者则偏重于研究黄遵宪的《朝鲜策略》对当时朝鲜外交内政的影响。

黄遵宪研究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具有国际性的专门学问“黄学”(犹如研究《红楼梦》的学问成为“红学”那样)。“黄学”的提法最早是新加坡华人学者郑子瑜在20世纪60年代初访问日本时提出的,并且立即得到日本老一辈学者实藤惠秀、铃木虎雄等人的赞同。1982年3月,广东梅县黄遵宪故居人境庐重新修复开放,并举行了全国首次黄遵宪学术交流会,有王瑶、黄友谋等专家学者70多人参加。1990年4月2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中国近代史开端150周年弘扬中华文化座谈会”上,各界人士和专家学者畅谈了黄遵宪在文学、史学、美学等方面的成就和贡献,香港实业家姚美良创办了“纪念黄遵宪先生当代书画艺术国际展览”,在北京、广州、香港、澳门、新加坡及世界各地巡回展览,反映强烈,盛况空前。1998年5月,由北京客家海外联谊会和北大中文系等单位共同组织的“纪念黄遵宪诞辰1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2001年在北京大学举行了黄遵宪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

又把黄遵宪研究推进到 21 世纪的新阶段。黄遵宪研究已引起海内外广大人士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概括起来,大约从 20 世纪 40—70 年代是黄遵宪研究的初始阶段,80—90 年代是发展阶段,据不完全统计已出版研究著作、传记、资料 20 多部,发表论文 200 多篇。

可以说黄遵宪是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最杰出贡献最大的一位代表人物,尤其黄遵宪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关系是黄遵宪研究中最受关注的方面。

本人曾在拙著《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近代中日启示录》、《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等书中加以初步的探讨。国内外许多学者也发表了许多有关论文。围绕这个主题大概有以下方面的研究课题。

三、《日本国志》研究

《日本国志》是黄遵宪对中国的日本研究和中日文化交流的最主要贡献。可以说这是近代中国人研究日本的一部集大成代表作。因此,对《日本国志》的研究在黄遵宪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日本国志》一书共 40 卷 50 万字,分为国统、邻交、天文、地理、职官、食货、兵、刑法、学术、礼俗、物产、工艺等 12 种志,内容极其丰富。该书全面深入地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日本明治维新后所实行的各种制度,同时也从各个方面阐述了黄遵宪主张学习西方、效法日本,要求在中国变法维新,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思想。

对《日本国志》的研究,最初只是一些零星片段的介绍和分析。20 世纪 70 年代吴天任的传记和石原道博的论文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笔者喜读《日本国志》,在反复研读基础上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在《近代史研究》1980 年第 3 期上发表了《黄遵宪〈日本国志〉初探》的长篇论文,以后在拙著《近代中日启示录》中也做专章论述。笔者认为黄遵宪写作《日本国志》的动机主要有三点:一是作为一个外交官的责任,为开展对日外交与加强中日友好的需要。二是不满以往中国对日研究状况,要提供日本真实详细情况,以改变中国人对日本的模糊认识与错误观点。三是他亲眼见到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效以及国内外对明治维新的分歧看法,促使他下决心重点考察日本维新后的制度及其利弊得失,提供借鉴,以推动中国的维新变法。

关于《日本国志》的写作过程和版本,据笔者考证,黄遵宪于 1878 年开始收集材料,1879 年正式动手编写,1882 年调离日本时刚写出草稿,1887 年才完成全书。1890 年交广州富文斋出版,直到 1895 年才正式刊成问世,即光绪十六年羊城富文斋的初刻本。1896—1897 年黄遵宪又把书稿进行了修改,改动十几处,增补数千字,1898 年出版了羊城福文斋的改刻本。其他版本都是根据黄遵宪自己手定的这两种版本重印的。如 1898 年浙江书局本是初刻本重印,而 1898 年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铅印本,汇文书局本及 1901 年上海书局石印本、1902 年丽泽学会石印本等都是据改刻本翻印的。近几年,陈宗海、盛邦和、郑海麟等人的论文和著作中也考证了《日本国志》的版本,并对初刻本进行了校勘、比较和分析。

关于《日本国志》的写作特色,笔者认为主要有四条。第一,黄遵宪屏弃了以往中国文人写史时那种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妄自尊大态度,采取实事求是,尊重日本民族、两国平等相待的态度来写作。第二,《日本国志》既区别于以前那种摘引古书繁琐考据日本历史的著作,又不同于当时一些仅仅浮光掠影记录日本风俗、人情、景色的游记。黄遵宪采取史书中“志”的体裁,着重研究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典章制度,体现了“厚今薄古”,为中国改革提供借鉴的精神。第三,黄遵宪反对那种粗枝大叶、人云亦云的写作态度,重视实地调查研究和收集公报、法令、统计数字等第一手原始资料。第四,黄遵宪在书中不仅详细介绍日本各方面历史现状和制度,而且联系中国实际进行分析评论,发表自己见解,总结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教训,给中国有识之士很大启迪。吴天任在《黄公度先生传稿》中也总结了《日本

《日本国志》写作上的四大特色：其一，记述则去取谨严，繁简适中。其二，附表则纵横尽括，纤悉靡遗。其三，前后论断，则引证古今中外，得失尽见。其四，附注则连类并及，考证详明。

关于《日本国志》的意义和影响。笔者认为首先是大大加深了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成为中国人了解日本的必读参考书。张之洞曾把它称为出使日本必不可少之书。20世纪涌向日本的大批中国留日学生更是从中得益匪浅。其次，《日本国志》的写作和出版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人对日本的研究。19世纪80-90年代一批驻日或旅日官员因形势需要和受到黄遵宪的影响，纷纷研究日本问题，写出一批著作。有的研究日本著作如王先谦的《日本源流考》中大量引用了《日本国志》原文。然而《日本国志》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还在于宣传了资产阶级变法维新思想，推动了戊戌维新运动。《日本国志》使中国要求维新救国的知识分子大开眼界，大受鼓舞，增强了变法的决心和信心，明确了方向和方法，即以日本为榜样，走明治维新的道路，因此也可以说它是一部维新变法的启蒙读物，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上书皇帝和编写《日本变政考》曾参考《日本国志》。梁启超不但为《日本国志》写后序，而且把它定为学习西学的必读之书。1898年百日维新前夕光绪皇帝为了借鉴日本经验，曾亲自命大臣立刻进呈《日本国志》两部，大臣没有及时送上，还遭到他的责备。1990年新加坡林文庆博士在一篇关于中国维新运动的文章里，把《日本国志》称之为“关于日本维新运动历史的经典性文献”，并认为该书为中国的维新党人“开启了道路”。

郑海麟在《黄遵宪与近代中国》一书中专列一章“《日本国志》研究”，着重分析了《日本国志》的明治维新观、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军事与文教改革的观念，还重点剖析了邻交志、学术志和礼俗志。盛邦和的《黄遵宪史学研究》一书实际上也是以《日本国志》研究为中心的，尤其是深入论述了《日本国志》的史学特色和史学思想，认为该书反映了黄遵宪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历史变易观向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历史进化论的转化。

四、《日本杂事诗》研究

黄遵宪的诗历来是黄遵宪研究中的热点，为海内外中国文学研究者所注目，许多人以其主要诗集《人境庐诗草》与《日本杂事诗》为研究对象，发表了不少篇论文，出版了各种诗选。

关于《日本杂事诗》的写作过程和版本。黄遵宪到日本后，细微考察日本的历史地理，认真研究日本的制度改革，游览名山大川，熟悉民俗风尚，了解工艺物产，比较中日文化，陆续创作了一百多首“杂事诗”。这些诗，每首都是七言绝句，或一事记一诗，或数事合一诗，短小生动，活泼有趣。每首诗的后面还附有长短不等的自注，以解释或补充诗意之不足，有的注较长，可自成一篇小文。他写这些诗也是为编写《日本国志》作酝酿准备，杂事诗自注的不少段落，后来稍作修改或者原封不动地写进了《日本国志》一书。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定稿本自序》中曾追述道：“余自丁丑（1877年）之冬，奉使随榎。既住东二年，稍与其士大夫游，读其书，习其事。拟草日本国志一书，网罗旧闻，参考新政。辄取其杂事，衍为小注，串之以诗，即今所行《杂事诗》是也。”

1879年冬，黄遵宪将《日本杂事诗》稿本2卷共154首诗，上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理衙门以同文馆聚珍版刊行，这就是《日本杂事诗》的初刻本，或称原本、官本。同年，王韬访日时也看到杂事诗诗稿，“读未终篇，击节者再，此必传之作也！亟宜早付民手，俚斯世得以先睹为快。”于是征得黄遵宪同意，将诗稿携到香港，于1880年出版了香港循环日报馆铅印本，以后此书又有日本风文馆、东京和京都书店以及国内中华印务局的各种翻印本。1885年，黄遵宪由美国归来，正值其父在广西梧州为官，亲友同僚索要《日本杂事诗》者甚多，乃又有梧州自刻本。1890年，黄遵宪在伦敦中国驻英使馆任参赞

期间，又把它增订为定本。1898年，由长沙富文堂刊行。定本删去原本中9首，增加55首，共计200首。卷首有自序，卷末有后记，这是黄遵宪本人最后手定的本子。他在后记中声明：“此乃完稿，有续刻者当依此为据，其他皆拉杂摧烧之可也。”1897年西政丛书的石印本尚按原本重印，1911年上海作新社洋装本是按定本翻印。日文译本有实藤惠秀与丰田穰合释的日本生活社本（1943年）和平凡社东洋文库本（1968年）。近年来最完善的版本是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中由钟叔河辑校的《日本杂事诗广注》。该书正文完全按定本校点排印，同时用按语形式，把原本被删改之诗全部附录于各首之后，另外还从《日本国志》中集辑有关内容，作为原注的补充，使注文字数增加了近三倍，故谓“广注”，并辑入了《人境庐诗草》中有关的几首诗，卷首还有钟叔河写的题解。1985年该书又收入岳麓书社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合订本之中。

《日本杂事诗》内容丰富，黄遵宪在初刻本中把154首诗分为9大类，即国势、天文、地理、政治、文学、风俗、服饰、技艺、物产。在定本中把200首诗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主要涉及历史、地理、政治、文学方面，下卷则偏重风俗、服饰、技艺、物产等等，实际上是对日本社会从纵和横的不同角度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描述。在纵的历史方面，涉及日本的社会发展史、政治史、对外关系史和文化史、学术史。在横的现状方面，介绍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自然风貌、民情习俗等等。正如周作人在《论黄公度的日本杂事诗》一文中所指出的：对于《日本杂事诗》，“当作诗看是第二著，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看作者的思想，其次是日本事物的记录。”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在《日本杂事诗》日译本的解说中也指出黄遵宪在诗中“不只是研究日本现状，而且从宣传着手，研究各方面的情况，将日本同中国作全面的比较，表现出想要把中国从危机中挽救出来的爱国热情”。因此，对《日本杂事诗》的研究不仅在从文学角度，还要从政治、思想、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角度加以分析。例如对于日本明治维新的认识，在《日本杂事诗》初刻本154首诗中涉及明治维新改革的就占40多首。然而他对明治维新也有个认识过程。正如黄遵宪1890年在定本自序中所述，他刚到日本“时值明治维新之始，百度草创，规模尚未大定”。对明治维新的议论纷纷，他接触的又不少是旧学家，“微言刺讥，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因此他在《日本杂事诗》初刻本中还流露出对明治维新的怀疑，“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以后黄遵宪“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后来又到欧美，见“其政治学术，竟与日本无大异”。“时与彼国穹官，硕学言及东事，辄敛于推服无异辞”。所以他“偶翻旧编，颇悔少作，点窜增损，时有改正”。对《日本杂事诗》又作了较大修订增补，出版定本。因此，如果把《日本杂事诗》的原本与定本加以比较研究，也可以反映黄遵宪思想的变化。

《日本杂事诗》作为近代中国人介绍日本最出色的一部诗集，以其构思新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和词采绚丽，博得中外文人学者的高度评价。为《日本杂事诗》作序的近代著名学者王韬称其：“叙述风土，记载方言，错综事迹，感慨古今。”“其间寓劝惩，明美刺，存微旨，而采摭浩博，搜辑详明。”“举凡胜迹之显湮，人事之变易，物类之美恶，岁时之送迎，亦并纤悉靡遗焉，洵足为巨观矣！”以至“每一篇出，群奉为金科玉律，此日本开国以来所未有也”。为《日本杂事诗》作跋的日本著名学者石川英更誉为：“上自神代，下及近世，其间时世沿革，政体殊异，山川风土服饰技艺之微，悉网罗无遗。而词彩绚烂，咀英嚼华，字字微实，无一假借。”他惊叹：“公度来日本未及二年，而三千年之史，八大洲之事详确如此，自非读书十行俱下，能如此乎？”简直佩服到五体投地无以复加的程度。当代日本学者佐伯彰一、芳贺彻主编的《外国的日本论名著》一书，也把《日本杂事诗》列为外国人描写论述日本的42种名著之一，并赞扬它是中国人对明治维新最初最细致的观察。

关于《日本杂事诗》的一件逸事值得一提，1879年9月，黄遵宪曾应日本友人源桂阁的请求，把《日

本杂事诗》的一部分诗稿埋葬在他的家园之中，模仿古代刘蛻的文冢、怀素的笔冢的典故，立碑题名为“日本杂事诗最初稿冢”。此碑原在东京浅草源桂阁故居，后迁琦玉县源泉桂阁家族墓地平林寺内。笔者曾亲往平林寺考察。碑上刻有源桂阁撰的《葬诗冢碑阴志》，生动记录了葬诗经过。在葬诗仪式上饮酒吟诗时，黄遵宪咏诗道：“一卷诗兮一抔土，诗与土兮护持之，葬诗魂墨兮江浒。”源泉桂阁也诗云：“咏琐事兮着意新，记旧闻兮事事新。诗有灵兮土亦香，吾愿与丽句兮永为邻。”这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段动人的佳话。

研究《日本杂事诗》还应该与研究黄遵宪驻日期间写作的其他有关日本的诗歌结合起来，这些诗主要收录在《人境庐诗草》卷三之中。诗的形式更加多样，有七律、七绝、七古、五绝、五古等，还有不少长诗，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如歌颂日本人民爱国精神和维新志士的长诗《近世爱国志士歌》、《赤穗四十七义士歌》、《西乡星歌》等，描绘日本风土人情的长诗《都踊歌》、《樱花歌》，以及《不忍池晚游诗》等都是出色的诗作。另外还有不少表达中日友好和与日本友人情谊的诗篇，如《陆军官学校开校礼成赋呈有栖川炽仁亲王》一诗中写道：“同在亚细亚，自昔邻封辑。譬若辅车依，譬若犄角立。所恃各富强，乃能相辅弼。同类争奋兴，外侮日潜匿。解甲歌太平，传之千万亿。”衷心希望中日友好，自强御侮。还有如《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的五首七律，也真挚感人，自述道：“海外偏留文字缘，新诗脱口每争传。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这些都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不朽篇章。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编的《人境庐集外诗辑》，收录了《人境庐诗草》刊本中未收的黄遵宪260多首诗，有些是黄遵宪在《人境庐诗草》定稿时删除的诗稿，有些是《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报刊上发表的作品，其中也有若干首与日本有关的诗及其他诗篇，值得深入研究。

四、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研究

笔谈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黄遵宪研究的重要资料。由于中日两国都属于汉字文化圈，日文中间含有不少汉字，而且许多知识分子都会读写汉字，因此两国人士相遇时，尽管双方语言不通，却往往仍然可以用笔写汉文的方式进行交流，通常称之为“笔谈”。像黄遵宪不会说日语，但仍然能与日本人士广泛交流、沟通思想，主要的方式就是依靠这种笔谈。因此保存下来的笔谈记录，是黄遵宪研究非常珍贵而且很有价值的原始资料。

现存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的笔谈资料最丰富的一批保存在《大河内文书》之中。《大河内文书》是日本明治时代旧贵族源泉辉声（号桂阁，祖居大河内，故又称源桂阁或大河内辉声）与访日中国、朝鲜文人的笔谈原稿，共有96卷，数百次笔谈。源桂阁每次去中国公使馆都准备好笔谈用纸，一问一答都写上面，当天晚上就把这些纸裱好，精心保存起来。甚至连当日接到与笔谈有关人物的信柬、便条，也附贴在笔谈纸之后，然后按顺序编排装订成册，精心保存起来。日本著名学者实藤惠秀曾把其中一部分译成日文，编著为《大河内文书——明治日中文化人的交游》一书。他还与新加坡学者郑子瑜合作，把其中与黄遵宪有关的笔谈，编校成《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一书，1968年由早稻田大学出版。这部书为研究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的交往及近代中日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笔者在访日期间，也在早稻田大学特别图书阅览室，阅读了《大河内文书》全部笔谈原稿，有幸观其全貌，并见到以上两书中没有收入的许多笔谈。杨天石在《光明日报》发表题为《海外偏留文字缘》的文章，也介绍了黄遵宪与源桂阁的笔谈资料。

收入《大河内文书》中的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的这些笔谈，内容涉及中日两国的政治、文化、艺术、学术以及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几乎是无所不谈。而且由于是私下随便交谈，毫无拘束，畅所欲言，更

能反映他们的真实思想和生活。黄遵宪曾在笔谈中畅谈两国文化渊源,评论古今各种作品。中日文人互相介绍本国的文学艺术及学术状况,发表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解。如黄遵宪向日本友人推荐:“《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者。恨贵邦人不通中语,不能尽得其妙也。”源桂阁也向黄遵宪介绍:“敝邦呼《源氏物语》者,其作意能相似。他说荣国府、宁国府闺阁,我写九重禁庭之情,其作者亦系才女紫式部者,于此一事而使曹氏惊悸。”中日文人还在一起讨论汉诗、汉文的写作问题,比较两国诗文的特色,交流各自的看法。在笔谈中常常可以看到日本人士向黄遵宪请教写诗、作文以及书法、读书。同时黄遵宪也经常向日本友人了解日本的历史、制度、典籍与风俗人情,有时还请他们帮助翻译日本史书和资料。笔谈中涉及对日本明治维新以及东西方文化比较等重大问题,尚待作更深入的研究。由于这些笔谈都是随手而写,有的字迹潦草、龙飞凤舞,不易辨认,而且往往没有署名,造成了研究笔谈原稿的困难。

黄遵宪在日本交往的各界人士甚多,仅诗文中提及的就有百余人。除了源桂阁的《大河内文书》之外,其他与黄遵宪来往较密切的日本人处也可能保存着与他的笔谈资料,需要深入调查挖掘。如宫岛诚一郎与黄遵宪是莫逆之交,他精通汉文汉诗,曾任明治政府修史馆官员,后任宫内省主事与贵族院议员。黄遵宪曾为他的汉诗集《养浩堂诗集》作序,并详加批阅,写了许多评语。在《宫岛诚一郎文书》中也保存了不少他与黄遵宪的笔谈、书信资料。因宫岛诚一郎与源桂阁的身份、思想、性格不同,笔谈内容也很不一样,这部分资料如果公开以后,值得作深入研究。日本学者佐藤保曾撰写论文《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介绍两人的友谊和交往。黄新铭的《热诚的期望,真挚的友情》一文,则着重剖析了宫岛诚一郎赠黄遵宪的5首七律汉诗。

五、黄遵宪与日本民俗研究

黄遵宪在民俗学研究方面也是一位伟大的先驱者。他在一百多年前,也就是民俗学作为一门科学在世界上刚刚诞生,而中国和日本的民俗学学科尚未建立的时代,就已经对民俗学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并对中国和日本的民俗进行了大量考察、描述和比较研究的实践,开中国近代中外民俗研究之先河,为中日民俗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85年杨宏海曾发表《黄遵宪与民俗学》一文。笔者在1991年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办的中日民俗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了论文《黄遵宪对中日民俗研究的贡献》。

黄遵宪系统研究日本民俗并阐发民俗学理论的重要著作《日本国志·礼俗志》,对中日民俗学研究有着巨大的开拓意义和深远影响。他在这部著作中深入探讨了民俗的形成,阐述了民俗的民族性、地域性、变异性特点,以及研究民俗的目的态度等理论问题。他认为民俗主要是由不同地域的人民的生活习惯逐步发展而约定俗成的。民俗一旦形成,对人们有很大的约束力,能够成为群众生活的规范。因此他认为研究民俗的主要目的在于移风易俗、治国化民。他指出每个国家的民俗都有好与不好两个方面,研究外国民俗,可以借鉴取法别国的长处,认识改革自己的短处。他《皇朝金鉴序》一文中,批评了当时某些日本人盲目追求全盘西化,鄙弃本民族习俗的错误倾向。正因为如此,他特别重视对外国民俗尤其是日本民俗的研究。

黄遵宪是近代中国对日本民俗进行深入系统调查研究的第一人。他对日本民俗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几乎涉及现代广义民俗学概念所包含的各个领域。在《日本杂事诗》中,黄遵宪分别描述了日本的宗教(如神道、佛教、天主教),祭祀(如新尝祭、大尝祭),婚娶(如皇族婚配、聘礼嫁妆)、丧葬(丧事、葬礼、火葬),游艺(如郊游、猎射、杂技),饮食(如料理屋、茶道),居室(如宫室、泥屋顶),工艺(如陶器、七宝烧)等等。在《日本国志·礼俗志》中,又把日本民俗分为四卷十四类加以介绍。第一

卷包括朝会、祭祀、婚娶、丧葬四类，第二卷包括服饰、饮食、居处、岁时四类，第三卷包括乐舞、游宴两类，第四卷包括神道、佛教、氏族、社会四类。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社会文化等各个角度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民俗文化。

黄遵宪调查研究日本民俗的方法，首先是广泛收集关于日本民俗文化的各种文献资料，仅《日本国志·礼俗志》中引用的中日文有关典籍就达数十种之多。同时，他又广泛结交日本各界人士，利用一切机会，虚心向他们请教，询问日本各种民俗。此外，他还时常亲自到街头巷尾作实地考察采风，获得第一手感性材料。黄遵宪对日本民俗的研究经常从历史演变发展的角度引古证今，溯源明流，并把日本民俗与中国民俗加以比较研究，考察其异同和互相影响。

黄遵宪对日本民俗的研究，既有生动具体的文字介绍，又有详实细致和史料考证，还有形象优美的诗歌描写。如他的《日本杂事诗》中就有相当多的作品是以日本民俗为题材的描绘了一幅幅绚丽多彩的日本风俗画。此外他还写了好多首描写日本民俗的长诗，如收入《人境庐诗草》的《樱花歌》惟妙惟肖地描绘日本举国如痴如狂观赏樱赏花的习俗。《都踊歌》则栩栩如生地表现了日本京都节日歌舞的民间风俗，诗中对歌舞者的舞姿、服饰都作了细腻传神的刻画。

黄遵宪与日本民俗已成为黄遵宪研究的课题之一，因此在郑海麟和盛邦和关于黄遵宪的著作中，都有一定篇幅论述这个问题。郑海麟认为《礼俗志》是《日本国志》中最用功的篇章之一，其内容之丰富，征引材料之广博，为其他篇章所不及。“从国际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无疑具有世界意义。”盛邦和认为黄遵宪是用资产阶级文明史学的思想指导民俗研究，主张“民俗即史”，即通过民俗叙述民众的历史。还主张从民俗的演变发展前后异同中，以微见著，探寻历史前进的足迹，概观社会经济、政治的面貌，为论证历史发展的因果趋势寻找佐证。

六、黄遵宪研究的展望

黄遵宪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黄学”发展方兴未艾，黄遵宪与日本等专题研究也还有很大潜力。

笔者认为可以以下几个方面来推动黄遵宪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第一，进一步收集、整理、标点、注释黄遵宪的各类作品，编辑出版黄遵宪的全集，这是“黄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黄遵宪的作品比较分散，除了已刊的《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人境庐诗草》、《人境庐集外诗辑》、《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以及《黄遵宪文集》外，还有不少散见于各种报刊的文章与亲友的通信、笔谈、为别人写的序跋、诗文、题词、墓志铭以及各种公文、函电、便笺等等，收藏于中外公私各处，需进一步收集、整理，并集中力量编成一部较完备的全集，早日出版，供研究者利用。

第二，编写《黄遵宪年谱长编》，把能够搞清楚和收集到的黄遵宪生平事迹、活动资料、作品信件等按时间编排，力求详尽准确，可为研究者提供很大的方便，同时也可以收集黄遵宪的有关图片、文物、手迹等编一部《黄遵宪图录》。

第三，在全面深入研究黄遵宪的基础上，撰写有更高学术水平的黄遵宪《大传》或《评传》，把黄遵宪放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及中外互动关系与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下，深入剖析他的生平活动、思想演变和心理状态，实事求是地评述黄遵宪及其著作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第四，继续深入进行各个领域、各种角度的专题研究。除了可以进一步探讨黄遵宪的政治思想、外交思想、文学思想、史学思想外，他的经济思想、学术思想、法律思想、教育思想等则是以往研究的薄

薄弱环节。同时，除了可以进一步研究黄遵宪在湖南和日本的活动之外，他在美国、英国、新加坡的事迹也需要深入调查研究。这些专题都可以撰写论文和专著，也可以出版综合性的黄遵宪研究论文集。

第五，加强各国、各地、各学科黄遵宪研究者之间的联系和学术交流，互通资料和信息。

相信通过本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和大家的努力，必将会大大推动黄遵宪研究的进一步繁荣发展。

作者简介：王晓秋，北京大学中外关系史研究所所长，教授。

黄遵宪的开放意识及其诗歌的审美取向

郭延礼

摘要：黄遵宪是近代“诗界革命”中最有成就、最有代表性的诗人。诗人足迹几遍五洲，有着十余年的外交生活经历，视野宽广、思想开放，融汇中西文化，开拓了中国诗歌前所未有的广阔领域和新的审美范围，在中国诗歌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中迈出了勇敢的一步。

关键词：黄遵宪；诗界革命；新意境；日本杂事诗

黄遵宪(1848—1905)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时期最杰出的诗人，也是“诗界革命”中最有成就、最具代表性的诗人。梁启超把他推为“近世诗界三杰”^{[1] (P21)}之一，南社诗人高旭、新派诗人丘逢甲将其誉为“中国诗界之哥伦布”^[2]，可见黄遵宪在当时诗坛中的地位和影响。丰富的历史内涵，真挚的爱国热情，异国山水风情的奇丽多采，构成了他诗歌的新的意蕴和特色；新事物、新意境、新理趣融汇于旧风格之中，使他的诗带有那个特定时代文学变革的烙印。黄遵宪足迹遍五洲，有着十余年的国外生活经历，他视野开阔，阅历丰富，并能将自己的高识卓见，奇思妙想，熔铸于诗作之中，开拓了中国诗歌前所未有的广阔领域和审美范围，所谓以“中国之学，采欧美人之长，荟萃熔铸而自得之”^{[3] (康序，P1)}。黄遵宪是近代走向世界的诗人中较早和有代表性的一位。丘炜萆在《诗中八贤歌》中云：“奇思壮采黄京卿，地球九万堪纵横。门户不屑前人争，当关虎豹驱心兵。”^[4]这是对诗人黄遵宪画龙点睛的总体评价。

黄遵宪并不是一位专业作家，“穷途竟何世，余事作诗人。”^{[3] (P773)}他也不屑以诗人自居，但他却是一个诗人气质很浓的人。丰富的生活阅历，先进的开放意识，新的审美理想，加之他勇于探索、敢于革新的艺术创造精神，使他的诗歌不仅真实而艺术反映了甲午战争前后四十余年的历史，而且大大地开拓了中国诗歌的审美领域，描写了五洲风云、异国风光，表现了一种新的审美取向。

黄遵宪自1877年(光绪三年)出任驻日使馆参赞，1882年(光绪八年)奉命调任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旧金山)总领事，1885年回国，1889年任驻英二等参赞，翌年初启程，1891年(光绪十七年)又调任新加坡总领事，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他解职回国，前后在国外凡十四年，由东京而旧金山，经巴黎，转赴伦敦，再到新加坡，历经欧、亚、美、非四洲，纵横数万里。他有诗云：“我是东西南北人，平生自号风波民。百年过半洲游四，留得家园五十春。”^{[3] (P800)}这种丰富的国外阅历，使诗人对西方历史文化、政治制度 and 经济生活均有了较深刻的感受与认知。

黄遵宪在日本时，就开始研读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他说：“初闻颇惊怪，既而取卢梭、孟德斯鸠之说读之，心志为之一变，以谓太平世必在民主。”^{[5] (P55)}由于诗人长期住在欧美，在他思想中有较多的民主因素，他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体，而对美国的民主共和政体表示赞赏。他说美国是“民主立国，共和为政”，“不贪人土地，不贪人人民，不强与他人政事。”^{[6] (P395)}这里值得注意的，诗人1884年写有一首《纪事》诗^{[3] (P365—375)}，过去评论家对黄遵宪在诗中关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竞选时互相“攻击”、近乎笑剧的描绘，作了过多的肯定，而没有指出黄遵宪思想上对资

产阶级政党竞选认识上的局限，尤其是他还未能从民主制度深层次上去评价竞选问题。但黄遵宪毕竟是一位时代先进者，他对美国民主政治有亲身的体验。故他在诗中赞扬美国独立以来推行民主政治所取得的进步。

自树独立旗，不复受压制。红黄黑白种，一律平等视。人人得自由，万物咸遂利。民智益发扬，国富乃倍蓰。泱泱大国风，闻乐叹观止。

在这里黄遵宪对民主政治的赞扬和向往是十分明显的。他虽然对两党竞选认识上还有局限，认为是同室操戈，“至公反成私，大利亦生弊”。但却在诗末说：“究竟所举贤，无愧大宝位。”这两句诗表明黄遵宪对资本主义的“竞选”制度似乎还有一定程度的认同。民主竞选比起封建时代皇位的世袭毕竟是政治制度上带有革命性的变化和进步。

黄遵宪长期的国外生活，使他对西学有较深的了解。他是从较高的层次上对待西方文化的。他不仅认识到西方文化的长处，以赞赏的态度描绘了明末清初第一次西学的传入：“溯自西学行，极盛推康熙。算兼几何学，方集海外医。天士充日官，南斋长追随。广译《奇器图》，诸器何夥颐。惜哉国学舍，未及设狄鞮。”^[3] (P318) 而且批判了当时中国多数士大夫封闭保守、夜郎自大，以及对西方的毫无所知：“芒芒九有古禹州，南北东西尽戎狄。岂知七万余里大九州，竟有二千年来诸大国。”^[3] (P526) 末二句含有一个典故：1877年（光绪三年）奉命出使英国的第一任公使郭嵩焘，因为亲眼看到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和社会的进步，他在《使西纪程》中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两千年的文明啊！就为这句话，在满清官员中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并给他带来了革职的处分。黄遵宪写此诗的时间正是他任驻英使馆二等参赞居伦敦之时（1890），他目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想起十多年前郭嵩焘那句话的遭遇，真是感慨系之。这次出使英国，诗人也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弱肉强食，虎视眈眈，面此形势，而大部分中国士大夫仍是虚骄夸饰，对世界形势毫无认识，《感事三首》之三写道：

宋明诸儒虚论，徒诮汉大夸皇华。谬言要荒不足论，乌知壤地交犬牙。鄂罗英法联翩起，四邻逼处环相伺。着鞭空让他人先，卧榻一任旁侧睡。古今事变奇至此，彼己不知宁勿耻。^[3] (P529)

诗中的“宋明诸儒”，实际上指的是清代的士大夫和儒生。黄遵宪在这里已经完全摆脱了所谓华夷之界，而是站在世界潮流的前列，用一种先进的眼光和开阔的世界意识来批判当时中国士大夫中的妄自尊大、思想狭隘、不善于学习他人长处的传统陋习。黄遵宪多次在诗中批判中国士大夫的这种传统陋习，正是基于他先进的开放意识。

早在黄遵宪任驻日大使馆参赞时，他便反思中国士大夫的这种陋习。他说：“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论议也者，可不谓狭隘欤！”^[7]（作者自序）“好谈古义，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这正是中国士人在极度封闭环境中所形成妄自尊大、视野狭窄、不善于学习外国长处的陋习。诗人在批判中国封建士大夫这种狭隘的封闭意识的同时，又大力宣传对外开放、学习西方的重要意义。他以日本为例说：日本“近世贤豪，志高意广，竞事外交，骏驱乎进开明之域，[与]诸大国相抗衡。使闭关谢绝，至今仍一洪荒草昧未开之国耳！”^[7]（邻文志）日本如不实行以学习西方为核心内容的明治维新，就不可能有国强民富的今天。

黄遵宪学习西方的思想同样表现在对待日本明治维新的态度上。黄遵宪写有《日本国志》和《日本